

# 猿投神社的汉籍

[日] 高田时雄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猿投神社是一所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的古老神社,以保存古代汉籍写本而广为人知。该神社所保存的汉籍共计有八种,分别是《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及《白氏文集》,这些汉籍写本皆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汉籍写本在当时并非罕见的版本,而是极为普通的读本。日本镰仓时代以后,京都的学问逐渐影响至关东及其他地区,镰仓时代武家学问的精髓以金泽文库及足利学校的藏书为代表。不过,我们对地方寺院与民间的实际状况未必能够从上述藏书得到充分的了解。若欲探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初期汉学的平均水平、阅读内容及所使用的文本等问题,猿投神社收藏的汉籍写本将不失为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 猿投神社; 汉籍; 《古文孝经》; 《春秋经传集解》; 《论语集解》; 《史记》; 《文选》; 《白氏文集》

## Old Chinese Books Kept at Sanage Shrine

Takata Tokio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anage Shrine is an old shrine in the city of Toyota in Aichi Prefecture. It is well known that it houses a collection of old Chinese manuscripts of ancient books. The collection consists of classics such as: *Guwen Xiaojing*,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Lunyu Jijie*, *Difan*, *Chengui*, *Historical Records*, *Wenxuan*, and *Baishi Wenji*; they have been registered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perty. They are not especially rare; instead, these books are popular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each manuscript h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Guwen Xiaojing* is the oldest copy among the many Japanese manuscripts of this missing work;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represents a title copied from a block print edition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manuscript itself is a traditional text handed down by the Kiyohara family; *Lunyu Jijie* leaves hints that allow us to use it as a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Yishu* by Huang Kan; *Chengui* provides the date of the work and the annotator's name; *Historical Records* is a rare example of a historical text inherited by the Kiyohara family; two manuscript rolls from the book *Wenxuan* belong to the

[收稿日期] 2016-01-1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6-03-03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作者简介] 高田时雄(<http://orcid.org/0000-0003-2853-7873>),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日本古写本与语言史等研究。

original version of Xiao Tong; *Baishi Wenji*, bound as a booklet, preserves only part of the "xinyuefu" style,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textbook copied by a student. In Japan, from the Kamakura period onwards, the learning of cultural capital began to spread gradually to the East and other areas. Kanazawa Bunko and Ashikaga Gakkō are typical of the learning centers developed by the samurai class during the Kamakura period.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the local temples and among the people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ense, the Sanage manuscripts ca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materials to study the average and range of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local area, from the Kamakura period through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uromachi period.

**Key words:** Sanage Shrine; old Chinese books; *Guwen Xiaojing*;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Lunyu Jijie*; *Historical Records*; *Wenxuan*; *Baishi Wenji*

爱知县丰田市的猿投神社是以景行天皇时代被封于美浓国的大碓命为主祭神的历史悠久的神社。神社于平安时代的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于史书,作为三河国的三宫受到邻近地区的崇信。其中有一批汉籍古代写本的遗存,原来不甚为人所知,自从昭和(1926—1989)三十年代后半期一些学者对该神社所藏典籍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汉籍写本的存在才逐渐受到注意;至昭和四十一年(1966)这些汉籍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它们就更加引人注目。猿投神社所藏汉籍共有八种:《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帝范》《臣轨》《史记》《文选》《白氏文集》。不过仅有第一种《古文孝经》被单独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作为“猿投神社汉籍”被共同指定的是《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的七种。关于猿投神社的汉籍,笼统而言,也可以说是日本人所阅读的汉籍的缩影。它们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典籍的代表,是自古以来日本人读书的主要对象。因此都不是罕觐书,均为极其普通的典籍。然而,正因为是当时的普通读本,这些汉籍也就成为了解古代寺院汉学风貌的重要材料。

### 一

日本人通过汉籍才在文化上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逐渐深入思索。由于在汉籍传入前后佛教传入日本,故不能否认佛家研习的主要对象是经论章疏之类,但僧人也是广泛阅读了所谓的外典的。

一直执日本汉学牛耳的中央的博士家所传承的学问,在文本与训诂、读法上都墨守成规,具有很强的保守性,然而也因此常有保留了在中国已经亡佚的唐代以前文本的情形。近年来不仅日本国内,中国也对日本古代写本给予密切关注,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出于对日本古代写本的关注,江户时代的学者不断努力,认真地进行了资料搜寻以及校勘学研究,其成果也传到中国,并引起了巨大反响。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太宰春台的《古文孝经》校本、根本逊志的《论语集解义疏》等都是此类成果,这些工作说明日本古代写本具有很长的传承历史。尤其是后两者让中国学者知道了所谓古佚书的存在,及至林述斋的“佚存丛书”传到中国,中国学者的期待越发强烈。当时,被称为乾嘉之学的重视考证的学风在中国风靡,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辑佚学是搜集其他书籍所引用的片段以复原佚书的学问,是在清代得到发展的各种学问中较有特色的一门。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对残存于日本的文献寄予期待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也是如此,明治时期杨守敬到日本后得到森立之等的帮助,购求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写本,又帮助黎庶昌编印“古逸丛书”,这对日本古代写本的利用来说是划时代的创举。

关于典籍的文本,中国学术界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宋元古槧的传统,认为其最可信。这是因为中

国很早就利用了印刷术,书籍以刊本的形式流传,古代写本归于湮灭,宋元版本以前的唐代写本、更早的六朝写本都不得而见。完全推翻这种常识的大概可以说是敦煌写本的发现。20世纪初叶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数万种古代写本多是佛典,但也有不少其他典籍。而在以吐鲁番为代表的新疆各地的遗迹也发现了唐代写本,它们与敦煌写本都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古代写本仍然受到一定的关注,但不像敦煌写本那样因有轰动社会的事件而常被提及,因此没有被作为特别的研究对象而得到发展,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真正同时研究这两者的并不多。然而,近年中国对日本古代写本开始关注,应是因为对敦煌写本的研究基本告一段落;同时,敦煌写本往往仅是残篇而不见全书,与此相比,日本古代写本则多数保存了完帙。中国方面兴致高涨当然也刺激了日本国内的研究,多有相互裨益之处。有关猿投神社的汉籍,中国学者也有一两种研究成果。

关于汉籍传入日本的时期,根据《古事记》所载,据说最早是应神天皇二十年(289)和迹吉师(王仁)从百济进贡《论语》10卷与《千字文》1卷,共11卷,但这不过是传说而已。从历史上看更可靠的是《日本书纪》中关于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送来五经博士段杨尔、翌年又派来同为五经博士的汉高安茂替换段杨尔的记载,一般认为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的学问才传到日本<sup>①</sup>。《论语》《千字文》之类的书传入日本大概是6世纪初叶。此后,各种汉籍陆续传入,通过汉籍的学习,日本的汉学水平不断提高。

推古天皇时代派出以小野妹子为正使的遣隋使,其重要使命之一是购买书籍。室町时代中期,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所著《善邻国宝记》引用的《经籍传后记》一书有“以小治田朝(推古天皇)十二年……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缘遣小野臣因高(妹子)于隋国,买求书籍”<sup>②</sup>的记载。由于正史没有这种记载,该书性质也不明确,因此无法完全置信,但看来也合情理。此外,这部《经籍传后记》想必是《经籍传授记》。这个书名见于东福寺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sup>[1]</sup>,恐怕是在传抄时将“授”字误为“后”字。从意义上看,“授”字比较通顺。它应是叙述经籍传入日本经过之书。

隋亡唐兴以后,日本更加积极地派出遣唐使,并将派遣唐使作为国家谋求全面引进新文化的制度。这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事实,充满新知识的书籍大量传入日本。随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与留学僧或多或少带回了相当规模的书籍。僧人似有义务在回国后向朝廷提交舶来品的目录,留下了以最澄《传教大师将来目录》<sup>③</sup>、空海《新请来经等目录》为代表的许多携来目录。但几乎全是佛典,关于外典的信息并不多。

同遣唐使随行带回书籍的诸人之中,养老元年(717)入唐的玄昉与吉备真备的功绩值得大书特书。玄昉于天平七年(735)归国时带回了经论五千余卷及诸多佛像<sup>④</sup>,这个数字无疑是指《开元释教录》所收经论的5048卷,可知玄昉将当时长安寺院行用的写本《一切经》全部带回。而吉备真备带回的主要是外典。据《续日本纪》“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记载,同年真备献上《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等<sup>[2]</sup>。当时急需仿效中国完善礼制,因此才先献上这类书籍,真备携来的典籍当然不可能仅有这些。据《日本国现在书目》的记载可知,真备还带回了《东观汉记》130卷,但其所携书籍全貌失传是极其遗憾的。《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

① 参看神田喜一郎《飛鳥奈良時代の中國學》,见《大和の古文化》(近畿日本铁道1960年版),今据《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同朋舍出版1987年版)所收,见该书第5-9页。

② 《日本書紀·推古紀》作十五年。

③ 最澄亲笔书写的目录有《台州录》与《越州录》两种。前者因织田信长火攻比叡山而烧毁,后者至今仍珍藏于延历寺,被指定为国宝。《台州录》于文政四年大师千年忌日之际有根据传抄本影刻的版本行世,因此幸而可知目录的内容。

④ 《续日本纪》“天平十八年六月己亥”条玄昉的卒传,见《新訂増補國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1976年版,第188页。据日本六国史的体例,名人传记系于其逝世年月,叫作“卒传”。

(717), (日本)又遣使来朝, 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此人)所得锡赉, 尽市文籍, 泛海而还……”<sup>[3]</sup>卷一九九, 5341 此处虽然未写名字, 从年代来看, 一般也认为这个人物就是吉备真备。因此可以想象真备携来的汉籍是有相当数量的。重野安绎说, “本邦之教学创自王仁, 成于吉备公”<sup>①</sup>, 尤其是在引进汉籍方面, 吉备真备有划时代的功绩。

进入平安镰仓时代后, 从中国进口书籍仍未停止。在遣唐使制度废除以后, 入唐的僧人仍未消失, 因有他们, 书籍得以继续进口。而且通过私人贸易, 汉籍不断传入, 满足了知识分子的需要。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叙述了中国人曾令文带来《五臣注文选》与《(白氏)文集》之事<sup>②</sup>; 曾令文同时带来了苏木与茶碗, 一定是个海商。

而且中国在 10 世纪以后, 印刷的书籍开始流行, 中古以来的写本渐为刻本所淘汰。后来这种潮流也波及日本。保守的博士家等虽仍墨守家传的读法与训诂, 但也常常参照新来的印刷本, 印刷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正如下文所述, 猿投神社的写本也可见到刻本的影迹。在佛典的世界, 作为最早印刷的大藏经的宋代官版大藏经, 即所谓的开宝藏, 也早已由裔然携至日本。再者, 高丽藏与福州东禅寺版、同在福州的开元寺版也相继传入日本, 还根据这些书制作了写本。

此外, 新印刷的书籍多已脱离了卷子本的形态, 成为便于翻阅的册子。在写本时代虽然已经根据用途使用了册子, 但正规的书籍仍然是卷子。但从中国传来宋元刻本以后, 这种观念逐渐发生动摇。猿投神社的汉籍多是卷子, 但《古文孝经》与《白氏文集》的一种写本已经是册子了。

## 二

以上简单回顾了日本的古代汉籍写本及汉籍传入的情形, 接下来试对猿投神社汉籍的各书进行解说。

先谈《古文孝经》。《古文孝经》在中国早已失传, 直至太宰春台的校本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后才为中国所知。这一点上文略有涉及。唐开元十年(722), 玄宗为今文《孝经》亲撰御注, 又于天宝二年(743)再次修订, 颁行天下。因此, 以前通行的今文的郑玄注、古文的孔安国注都失传了。经文有今古文之别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有关议论无法避而不谈, 故先说明一下其概况。

秦始皇焚书使儒家经典多蒙灾厄, 始皇同时制定“挟书律”, 禁止民间藏书。然而汉惠帝四年(前191)该法令被废除, 不久就采用“广开献书之路”的政策, 于是学者们逐渐拿出隐藏的书籍, 或根据口传而得的经文进行经书的讲说。这些文本均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 因此称之为今文。例如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 本是秦代的博士, 因为焚书而将《尚书》藏于故乡旧居的壁中, 到了汉代取出后发现多已佚失, 仅得二十八篇。汉文帝听说伏生传《尚书》, 欲招之来, 但当时他年已九十, 步履维艰, 因此文帝派晁错向伏生学《尚书》。伏生的文本原来是以小篆书写, 此时改写为隶书, 《春秋》与《诗》等通过口授而流传的文本也是在这个时期以隶书书写。今文家各守一经的师法立于学官。

另一方面, 关于古文,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 景帝之子)为扩建自己的宫殿而计划毁坏孔子的故居后从壁中得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 均以古代文字书写。据说恭王进入其故居后听到弹奏琴瑟钟磬的声音, 因此恐惧, 放弃了破坏的计划<sup>[4]</sup>卷三〇, 1706。其后, 孔子的后代孔安

① 重野安绎《右大臣吉備公傳》赞, 见同氏《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明治三十四年, 吉备寺藏版)第 8 页背面。

② 《御堂关白记》“宽弘三年(1006)十月廿日”条, 见《大日本古記録》上册, (东京)岩波书店 1952 年版, 第 196 页。另外, 这两种书并非写本而是刊本, 这一点据《御堂关白记》“宽弘七年(1010)十一月二十八日”条中提到在献给天皇时称之为“摺本”(即刷印本)可知, 见同上, 中册, 第 82 页。

国进行整理,献给朝廷,因故未及通行。除孔宅的壁中书外,尚有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献上得自民间的《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记载。如上所述,西汉时代各种古文经典虽已出现,却未通行于社会。到了西汉末年,刘歆从皇宫的书库中发现古文经典,对其进行了整理,并再三推崇古文,在哀帝时请求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却因当时今文派博士的反对而遭遇挫折。

由于以上原因,到了东汉时代,今古文的对立、争论非常激烈。原来不过是书写文字的不同,但因为相应经文的解释甚至政治思想的不同,形成了学派上的巨大差异。

而《古文孝经》本是孔宅壁中书之一,有孔安国的注。与此相对,《今文孝经》有郑玄的注本。日本学令中有“《孝经》,孔安国、郑玄注”,可知今文的郑玄注以前也通行过,但不如《古文孝经》盛行。《续日本纪》孝谦天皇天平宝字符年(757)的敕中有“宜令天下家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一般认为是古文<sup>[5]卷三,300</sup>。不过该敕文的文句几乎完全沿用玄宗天宝三载(744)十二月的敕<sup>①</sup>。玄宗本意在于推广自己的御注,不过日本因有此前的时代背景,想来大概是用古文。但贞观二年(860)日本也发布了在正式场合应该采用御注的命令,指出今后御注立于学官,应教授此经。尽管如此,该敕文末尾附有但书,称若仍尊孔氏注,亦许讲诵<sup>[6]55</sup>。由此可知在日本《古文孝经》的读者根基甚深。

《御注孝经》也有开元本与天宝本前后不同的两种,这一点上文已经谈到,中国仅传有天宝本。关于开元本,屋代弘贤于宽政十二年(1800)据三条西实隆的点校本刊行的版本在日本通行一时,明治时期为杨守敬收入“古逸丛书”,因此在中国也逐渐广为人知。此本并非卷子本而是采用册子本的形态,让人推测原是抄写此本的人用于自己学习之本<sup>[7]53</sup>。

猿投本的《古文孝经》在卷末有以下跋文:

书本云承安四年甲午(1174)正月上旬肥州二千石令授于予/毕即以清家之证本所写取也  
此本者 师匠御/手迹也 契真法师记之

建久六年(1195)乙卯四月廿六日美州远山之庄饭高寺书写了

此本被阿部隆一在校勘日本所存旧抄本时用作引据的诸本之一<sup>[8]9</sup>。阿部认为“肥州二千石”是指对清原家的家学复兴做出贡献的清原赖业(1122—1189)。如是,则该写本的原本是清原赖业传授契真法师的清家历代承袭的家传文本,此本是美州(美浓)饭高寺之僧于建久六年传抄的。作为《古文孝经》年代明确的写本,猿投本是最古老的,被单独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应该也是鉴于其重要性。

而敦煌写本中未见《古文孝经》,敦煌写本中最值得注意的《孝经》注是《御注孝经》元行冲的疏(P. 3274)<sup>[9]64</sup>。这是保存了《开宗明义章》“复坐吾语汝”以下直至末尾的相当长的长卷,但最初的61行残去了后半。幸而卷末载有“天宝元年(742)十一月八日于郡学写了”,可知其书写年代。这是作为郡学的教材由学生书写的。敦煌于隋代大业年间置敦煌郡,但到了唐代武德二年(619)改称为瓜州,五年(622)改称为西沙州,又于太宗贞观七年(633)改为沙州。唐代一般称为沙州,玄宗于天宝元年以该地为敦煌郡,这个名称延续到乾元元年(758)再次改称为沙州为止。该写本提到郡学正是由于天宝元年的改称。

《春秋经传集解》是西晋杜预对《左传》的注释,早已与经传的本文并行。后来被合以孔颖达的《正义》编入《十三经注疏》。就今古文之别而言,《左传》是古文,《公羊传》《穀梁传》属于今文系统。

①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的敕文见于《唐会要》卷三五,在字句上与《唐大诏令集》卷七四所载者有若干不同。参见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17页。

传统上认为《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但也有他人所作之说,如康有为认为是西汉刘歆的伪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的文本是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在左丘明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经传集解》在日本古代写本与敦煌写本中都为数不少。作为《左传》的注释,除杜预《集解》外,东汉服虔的注在古代亦行于日本,今已失传<sup>①</sup>。藤井有邻馆所藏的卷二作为唐抄本很有名,被指定为国宝。作为日本旧抄本,东洋文库有卷一〇,石山寺有卷二六、卷二九的残卷,也都成为国宝。此外,宫内厅书陵部藏有金泽文库旧藏30卷的全部,毫无残缺。此本是清原教隆(1199—1265)传授给北条实时的文本,抄自清原家的家传本,此前竹添井井作《左氏会笺》时的底本就是此本。

猿投本残缺较多,只有一卷,但正文沿袭了清原家本。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杜预的“春秋序”之后可见“婺本点校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隐公卷第一”的文字。这显然是照抄刻本的题字,强烈暗示该写本的底本就是宋代的坊刻本。婺本是指刊行于婺州的书籍,婺州在宋代是一个很大的出版业中心,即现在的浙江金华。所谓“点校”表示附有句读标点;而“重言”是指对经典中反复出现的字句,在其下以反白形式注出“重言”表示其出现之处;同样,“重意”是指标示出现于他处的同义语句。婺本《经传集解》据说上海图书馆藏有残本<sup>②</sup>,目前未得寓目之便。幸而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的介绍,从该书的形式可知其意思如上所述<sup>③</sup>。总之这种坊刻本是作为科举考生的参考书而专门出版的,传入日本后也受到重视。但猿投本是否照抄宋版呢?其实绝非如此,可以认为主要是利用了传世的古代写本。一是因为猿投本在对经与传加以标示以作区别时有一个字的抬头,这是写本时代的习惯而不见于刊本;二是猿投本虽然号称“重言重意”,却完全不见此种标注。这可能是因为宋版仅仅作为参考而置于案上,其标题碰巧混入了写本,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参考其他事例进一步探讨。

《论语集解》均是三国时期何晏的《集解》,存有三种不同的写本,共计五卷。数量最多的是康安二年(1362)书写的南北朝写本,在全书十卷中存有卷三、卷七、卷一〇,共三卷。现存部分是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以上卷三),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以上卷七),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以上卷一〇),但其中的开头或中间部分缺失。残余的写本是似为南北朝抄本的卷三的残本与或可晚至室町初期的卷四的残本。

儒家经典中拥有最多读者的是《论语》,这一点无庸赘言。因此,不仅日本有古代写本,敦煌、吐鲁番也发现了《论语》的许多写本。而《论语》也有今古文之别,汉初通行过今文的《鲁论》《齐论》与出自孔壁的古文《古论》。但东汉郑玄统一诸本并作了注释,今古文之争暂告停息。此后,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八家之说而著《集解》,因此后世此书独传。

但日本古代写本中还有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与何晏《集解》并行。此书清代传回中国,引起学术界关注,上已有述。到了近代,皇侃的《义疏》在敦煌写本中也有发现。关于该写本(P. 3573),根据与纸背所钤“宣谕使图书记”一同出现的“泛塘彦寻览”的人名,学者考证其写于896年之前,其

① 不过书道博物馆所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小残片应是服虔的注。参见白石将人《书道博物館藏吐鲁番出土〈左傳〉服虔注殘卷について》,载《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13年第7号,第347—360页。

② “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存十四卷(卷二至卷七,卷一五至卷一九,卷二三,卷二五至卷二六),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第2457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点校”变成“附音”,因此无法认为是完全相同的版本,但可以认为是类似的版本。

③ 参见吴璧雍《宝笈来归——记故宫新藏宋本〈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载《故宫文物月刊》2005年第269期,第35—36页。此外,近藤守重早已注意到“重言重意本”,点明“重言重意本者,帖括之书而宋末之俗本也”,解释说“音义之后设墨匡,标‘重言’或‘重意’或‘互注’,其下夹注其说”,又引证《经义考》等,值得参考。参看近藤正斋《正斋书籍考》卷一,见《近藤正斋全集》第2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06年版,第44—45页。

文本保留了皇疏的原貌<sup>①</sup>。在猿投本的康安二年抄本中,卷一〇子张第十九的眉批以“疏曰”的形式引用了皇侃的义疏,这个时代仍参考皇侃的义疏是耐人寻味的<sup>[10]113</sup>。

在皇疏以外,敦煌、吐鲁番还出现了不见于日本的郑玄注的许多写本,引起学者关注<sup>②</sup>。日本未尝行用郑注,应是因为郑注行于中国北朝,而隋唐以前的日本汉学是通过百济引进南朝的经学。

《帝范》12篇系唐太宗李世民御撰,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赐予皇太子李治(后来的高宗)。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这是阐述帝王的政治要诀。此书在唐代通行两种注,一是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的贾行注四卷<sup>③</sup>,另一种是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于敬宗宝历二年(826)进献的注(《旧唐书》《唐会要》)。传入日本的《帝范》确实有注,但还不清楚究竟出于何人之手。

中国在南宋时佚失了《帝范》12篇中的一半,元代于云南发现完帙,后收入明朝的《永乐大典》,在清代又收入《四库全书》,后以武英殿聚珍本刊行,因此,当时《帝范》已不是罕觐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云南发现之年是泰定二年(1325)。而德富苏峰在汉城(首尔)获得正文与《永乐大典》本相同且附有至治三年(1323)序的朝鲜铜活字本,据此否定了《提要》提出的泰定二年云南发现说。此外,朝鲜活字本的序文明确记载注的作者是元代的李元镇,《提要》则疑为元代人因唐人旧注而补之,对此德富也加以斧正<sup>④</sup>。阿部隆一已说明,清代许瀚的《攀古小庐文》已据明代都穆《铁网珊瑚》的记载,指出《永乐大典》本《帝范》的注为元代大德年间霸州李鼎元所撰<sup>[11]179</sup>,李鼎元就是李元镇。

猿投本仅有上卷,却是首尾完整的精抄本,存《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六篇。卷末有“以家秘本朱墨两点交合了”,考虑到其僚卷的《臣轨》的跋文,“秘本”可以认为是继承了菅原在良对鸟羽天皇进行讲授所用之书的系统的文本<sup>[12]34</sup>。在朝廷向天皇进讲《帝范》是一个长期的传统<sup>[11]180</sup>。

《臣轨》二卷为武则天撰,是阐述臣僚规范的书籍。武周时代结束后基本上被遗忘,南宋时仅有佚失了十篇之中后五篇的残本<sup>⑤</sup>,后来连此本也完全绝迹。如上所述,《帝范》在宋代也暂时只有残本,《臣轨》在中国则完全成为佚书,仅在日本流传。

武后于长寿二年(693)三月自制《臣范》,替换《老子》让科举考生学习<sup>⑥</sup>。唐室为李姓,故同为李姓的老子受到尊崇。因此武后于上元元年(674)向高宗上表,请求参照《孝经》《论语》于明经科采用《老子道德经》,于是上元二年(675)正月的明经科在进士试帖三条之外又试《老子》策二条。仪凤三年(678)三月又下敕以《道德经》与《孝经》为上经,贡举对此必须兼通。长寿二年武后废除《老子》,以自制的《臣轨》替换,此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意图。这种情形持续到唐室中兴的神龙元年(705)二月下敕命令“天下贡举人,停习《臣范》,依前习《老子》”为止。因此,《臣轨》用于科举前后共有12年。

传入日本的《臣轨》卷末均附有“垂拱元年(685)撰”的文字。关于这个纪年,《旧唐书》记载则天二年(长寿二年)“则天自制《臣轨》两卷”(《唐会要》同),因此过去有人提出过疑问,但现在根据日本

①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0页以下。并参看土田健次郎《儒教典籍》,见《敦煌汉文文献》(《讲座敦煌·五》),(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288页以下。

② 金谷治《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东京)平凡社1978年版;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两书网罗了郑注的敦煌、吐鲁番本,便于使用。

③ 四卷只是贾行注的分卷,传入日本的附注本分为上下两卷。

④ 其说详见苏峰将狩谷掖斋手校本收入其“成笈堂丛书”出版时所附的《帝範臣軌解題》,(熊本)民友社刊1915年版。

⑤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武氏称制时,尝诏天下学者习之,寻废。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另外,《读书志》以为书名并非“臣轨”而是“臣范”,并说“范或作轨”。“臣范”的名称亦见于《唐会要》《文苑英华》,可见很早就有由《帝范》类推而致误的情形。

⑥ 参见《唐会要》卷七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26页以下。

传本,垂拱元年说已成定论。而且《臣轨》与《帝范》一样附有注释,其作者为郑州阳武县的王德纂,这一点也据日本传本可知。近藤守重见过德川家康的手泽本,其卷首有“郑州阳武县臣王德纂注上”的文字,卷末有“本云,臣德纂述曰:其《臣范》中所引正经及子史学者,其正经之义则皆取先儒旧注,不敢更生异见,其[子]史之义则唯取河上公焉,余皆出自愚心,亦不师祖往说矣”,近藤据此论述过撰者问题<sup>[13]</sup>卷四,175-176。近藤在此跋之后云“本押纸(即浮签)也”,记述了可以见到以下文字:“《臣轨》既是御撰,妙极稽古垂范,千载作鉴百僚,既为臣之令模,乃事君之要道,宜诵登于口,诚藏于心,束发舛簪,庶多弘益,长安四年(704)三闰四日江都县孙祥记。”王德纂的跋及孙祥的题跋亦皆见于猿投本<sup>①</sup>。这大概是传入日本的祖本中的文字,可以说是证实其传承有绪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的《史记》极为有名,不需要多作解说,但想谈谈其流传与注的几个问题。《史记》全书有130篇,《汉书·艺文志》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认为西汉末年之前已经佚失10篇,《汉书·司马迁传》注引三国魏的张晏说,以为这10篇是《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列传》。关于这10篇,众说纷纭,或以为司马迁并未完成这10篇,或以为仅仅佚失了一部分,但一般认为是后人的续补。

《史记》在魏晋以后广为流传,据说东晋末年徐广作《史记音义》。此后,刘宋的裴骃在徐广的基础上参考经传百家及先儒之说作《史记集解》。裴骃之父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唐代以后,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集解》《索隐》《正义》称为“三家注”,本来是分别单行的。后来《集解》先附于正文通行,最终出现了所谓的三家注本通行于世。后世的版本一般在《五帝本纪》之前有《三皇本纪》,它不是司马迁原著,而是司马贞妄补的。

日本通行的《史记》几乎都是《集解》本,《日本国现在书目录》的正史家之首所举的《史记》八十卷正是《集解》,可以认为仅有正文的《史记》没有传入日本。敦煌遗书中的《史记》也是《集解》,可知中国在唐五代时期《集解》也是广为流传的。《现在书目录》尚可见到司马贞的《索隐》,梁代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唐代刘伯庄《史记音义》廿卷也被著录,但不清楚这些书在何种程度上被利用。

作为《史记》的古代写本,以珍藏于石山寺的奈良时代写本一卷(自卷第九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的中间部分到卷九七《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的末尾)为首,防府毛利奉公会的《吕后本纪》第九、东北大学的《孝文本纪》第十、大东急纪念文库的《孝景本纪》第十一(以上三卷是僚卷)以及石山寺本《夏本纪》第二、《秦本纪》第五的两卷都很有代表性,均被指定为国宝。奈良时代写本暂且不谈,一般认为毛利家以下各本都是传承于纪传道家的大江家的文本。

猿投本现在经过修补分为四卷。第一卷收入《吴太伯世家》第一与《鲁周公世家》第三,第二卷收入《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第三卷收入《卫康叔世家》第七与《宋微子世家》第八,第四卷收入《楚世家》第十。据说本来各为一卷,共八卷,各卷的卷首缺失。就世家部分全十二卷而言,则是佚失了《齐太公世家》第二及《晋世家》第九以下的四卷。

据山崎诚所言,猿投本《史记》与《春秋经传集解》笔迹相同,可能是清原家所传的《史记》<sup>[12]36</sup>。如是,由于现存诸本多为大江家的系统,可以说即使不考虑没有训点这个特点,猿投本也有独特的价值。

《文选》与《白氏文集》都是平安时代以来日本最受欢迎的书籍,因此以李善注、五臣注为代表的许多注释本传入是极其自然的。一般认为篇幅浩瀚的《文选集注》是在日本编纂的,正因为日本具备了这么多的资料才有这样的著作。本来金泽文库所传的《集注》写本,现在称名寺存有19卷,其余分散藏于各处,全120卷中有23卷现存于日本国内。由张元济传到中国的一卷现存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馆。

① 近藤守重所见德川家康手泽本与猿投本有很多共同点,大概是同一系统的写本。



虽然唐代有许多注释,但因后世盛行李善注及五臣注,这些旧注几乎全部亡佚。敦煌发现了无注本与李善注本,俄国藏的一本(Φ242)被认为是公孙罗的《文选钞》<sup>①</sup>。此外,归于细川氏永青文库的敦煌本又是另一种注本,被推测与五臣注本较近<sup>②</sup>。

猿投本《文选》是两种不同的卷子<sup>③</sup>,一本有镰仓时代弘安五年(1282)十月廿六日的纪年,一本附有同是镰仓时代载有“正安第四(1302)七 上旬 一校了”的跋,都是卷一无注本的《文选》。作为无注本《文选》,东山御文库藏的所谓九条本为人所知<sup>④</sup>,被认为是可以追溯到近于萧统原本的六朝、唐代旧本的文本<sup>⑤</sup>。就猿投本而言,弘安本与正安本的底本虽然不同,但也继承了萧统原本的系统,而且有学者认为弘安本比正安本及九条本更接近萧统原本<sup>[14]233-250</sup>。

《白氏文集》盛行于日本,当然也有日本的特殊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中国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与元稹诗并称为元白诗的这种诗风,不仅具有写实性与通俗性,而且深入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其名声自然传到日本。

据说承和五年(838),藤原岳守担任太宰少贰,在检查唐人的货物时偶然得到《元白诗笔》,因此献给朝廷,当时的仁明帝非常欢喜<sup>⑥</sup>。即使这不是最早的事例,当时《文集》已经传到日本也是毋庸置疑的。圆仁的携来目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也记载了“《白家诗集》六卷”<sup>⑦</sup>。圆仁在《目录》中说该《白家诗集》得自长安,圆仁旅居长安是在自开成五年(840)八月下旬至会昌五年(845)五月下旬,因此是在这个时期得到该诗集的。此外,同为入唐僧的惠萼于会昌四年(844)请五台山诸人书写《白氏文集》,此本经过转抄传到金泽文库<sup>⑧</sup>。白居易捐馆是在会昌六年(846),因此当时白氏还在世,可见白氏的诗名在其在世时已经很高了<sup>⑨</sup>。

猿投神社所藏的《白氏文集》不少。卷三有四件(卷子三卷与册子一帖),卷四有两件(卷子),共有六件。据其跋文,卷三的册子本是贞治二年(1363)在猿投社头由澄豪等抄写。卷三卷子的一本是贞治四年(1365)亦由澄豪于猿投社的莲花坊书写,卷子的另一本是贞治六年(1367)也在猿投社抄写。剩下的卷子一本可见“观应三年(1352)大簇中旬之候,文主千若丸”。千若丸还写了卷四的一本,其中有“于时文和二年(1353)七月中旬之比,参州渥美郡,于长仙寺,虽恶笔书写之云々,文主千若丸十五才”,可知是由学生书写的。卷四的另一本没有跋,书写年代不明,从笔迹来看大概也是学生书写作为教材的。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白氏文集》都只是“新乐府”部分。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正是这个部分,大概是只抄写这个部分作为教材。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卷三有一件不是卷子而是被装订成册子,使人联想到敦煌本的《白香山诗

① 石滨纯太郎为狩野直喜《唐抄本文選殘篇跋》所作的“书后”,见《東洋學叢編》,(东京)刀江书院 1934 年版,第 58-59 页。

② 参见神田喜一郎对《敦煌本文選注》的解说,(东京)永青文库 1965 年版。

③ 此外还藏有《文选序》的部分粘页装残本一折(两张四面),由于未见,此处从略。

④ 存有全 30 卷中的 22 卷。前后笔迹并不相同,成于众手,从跋文来看,据说底本是正应五年(1292)藤原长英所书写移点的,猿投本则写于南北朝前期。参看阿部隆一《東山御文庫尊藏(九條家舊藏)舊鈔本文選について》,见《阿部隆一遺稿集》第 1 卷宋元版篇,(东京)汲古书院 1993 年版,第 527 页。

⑤ 参见阿部隆一,同上,第 528 页。

⑥ 参看《文德实录》卷三“仁寿元年(851)九月廿六日”条所附藤原岳守卒传,见《新訂増補國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本 1973 版,第 31 页。

⑦ 《佛教书籍目录》第二,见佛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書》,(东京)佛书刊行会 1914 年版,第 14 页上栏。

⑧ 参看桥本进吉编《慧萼和尚年譜》,见《大日本佛教全書》六,(东京)佛书刊行会 1922 年版,第 531-540 页;神田喜一郎《林羅山手校の白氏文集》,载《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1982 年第 370 号,第 13 页。

⑨ 关于其文集在国内外辗转抄写的情形,白居易本人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即会昌五年五月一日写的《白氏集后记》(四部丛刊本《白氏长庆集》卷七一)中谈到“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此记”,据此也可了解。

集》(P. 2492)也采用册子本的形态<sup>①</sup>。在唐代的中國,文集以册子式的寫本形式通行于世,圓仁在長安購買的《白家詩集》可能也是這種形態。

以上為猿投神社漢籍的概況。關於鎌倉時代武家學問的精髓,金澤文庫及足利學校的藏書可為代表,但有關地方寺院與民間的狀況,從這些藏書未必能夠充分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探討鎌倉時代到室町時代初期漢學的平均水平及讀書範圍與所用文本方面,猿投神社的漢籍都不失為珍貴的資料。

### [参 考 文 献]

- [1]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東福寺文書』,『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5』,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  
[Historiographic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ed.), *Tofukuji Documents*, in *Japa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House Divided Documents (Dai Nippon Komonjo Iewak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2.]
- [2] 藤原繼繩、菅野真道、秋篠安人等編:『續日本紀』,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卷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年。[Fujiwara no Tsugutada, Sugano no Mamichi & Akishino no Yasuhito et al. (eds.), *The Shoku Nihongi*, in Kuroita Katsumi & Kokushi Taikei Henshū-kai(eds.), *New Edition of Kokushi Taikei: Vol. 2*,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Inc., 1976.]
- [3]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Liu Xu, *Jiu Ta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4]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Ban Gu, *Han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5] 近藤守重:『正齋書籍考』,國書刊行會編:『近藤正齋全集』卷三,東京:國書刊行會,1906年。[Kondo Morishige, *Seisai's Essays on Old Books*, in Kokushokankokai Corporatio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Kondo Morishige: Vol. 3*, Tokyo: Kokushokankokai Corporation Ltd., 1906.]
- [6] 藤原時平、大藏善行、菅原道真等編:『日本三代實錄』,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卷四,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年。[Fujiwara no Tokihira, Okura no Yoshiyuki & Sugawara no Michizane et al. (eds.), *Veritable Records of Three Reigns in Japan (Nihon Sandai Jitsuroku)*, in Kuroita Katsumi & Kokushi Taikei Henshū-kai(eds.), *New Edition of Kokushi Taikei: Vol. 4*,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Inc., 1977.]
- [7] 山本信吉:『古典籍が語る一書物の文化史』,東京:八木書店,2004年。[Yamamoto Nobuyoshi, *Classical Books Narrate: Cultural History of Books*, Tokyo: Yagi Bookstore, 2004.]
- [8] 阿部隆一:『古文孝經舊鈔本の研究(資料篇)』,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斯道文庫論集』6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1968年。[Abe Ryuichi, *Study of Old Manuscripts of Book of Filial Piety (Materials)*, in Sido Bunko,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ed.), *Bulletin of the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Vol. 6*, Tokyo: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1968.]
- [9]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Wang Zhongmin, *Study of Dunhuang Ancient Book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8.]
- [10] 高橋智:《日本南北朝(1336—1392)時代古抄本《論語集解》——猿投神社所藏本之意義》,見劉玉才主編:《從抄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1—131頁。[Takahashi Satoshi, "Ancient Manuscripts of the Collected Not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Japan(1336—1392): The Significance of Sanage Shrine's Edition," in Liu Yucai(ed.), *From Manuscripts to Block-printed Editions: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bou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1—131.]

①《白香山詩集》的書名是王重民所擬,現在已被否定。該寫本與俄藏的 Дх. 3865 相連,可知收錄的作品未必都是白居易的。因此,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 2000 年版)作“殘詩集”,據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21 頁)以下的論述來看,最好稱之為“唐詩文叢鈔”。

- [11] 阿部隆一：『帝範臣軌源流考附校勘記』，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斯道文庫論集』7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1968年。[Abe Ryuichi, *A Study of Textual Headstream of Difan Chengui with Collations*, in Sido Bunko,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ed.), *Bulletin of the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Vol. 7*, Tokyo: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1968.]
- [12] 山崎誠：「猿投神社漢籍解題目録」，豊田史料叢書編纂会編：『豊田史料叢書・猿投神社圣教典籍目録』，豊田：豊田市教育委員会，2005年。[Yamazaki Makoto, "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Old Books in Sanage Shrine," in Toyota Historical Documents Series Editorial Board(ed.), *Toyota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atalogue of the Classical Books Kept in Sanage Shrine*, Toyota: Toyota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2005.]
- [13] 近藤守重：『右文故事』，国書刊行会編：『近藤正齋全集』卷二，東京：国書刊行会，1906年，175 - 176頁。[Kondo Morishige, *Anecdotes on Literary World (Yūbun Koji)*, in Kokushokankokai Corporation(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Kondo Morishige: Vol. 2*, Tokyo: Kokushokankokai Corporation Ltd., 1906, pp. 175 - 176.]
- [14] 傅刚：《日本猿投神社藏〈文选〉古写本研究》，见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3 - 250页。[Fu Gang, "Study of Ancient Manuscripts of *Wenxuan* Kept in Sanage Shrine (Japan)," in Zhang Bowei (ed.), *Extraterritorial Chinese Research Archives: Vol. 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pp. 233 - 250.]

